

<<襄夏战梁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襄夏战梁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8632940

10位ISBN编号：750863294X

出版时间：2012-5

出版时间：中信出版社

作者：陈祖德

页数：46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襄夏战梁程>>

前言

吴清源我的助手牛力力从中国带回了祖德先生的消息，得知他正在研究和讲解清朝的古棋，这令我十分喜慰。

回思上世纪五十年代与川端康成先生的对话，我曾比较过中日两国在两三百年以前围棋发展的盛况。那时的日本围棋，在德川幕府的治下，出现了划时代的名人——道策，他的棋力超群，有“十三段”的美誉，更创制了“道策流”，开启了近代布局的先河，可以说是棋界了不起的大人物。

但在清朝康熙、乾隆年间，中国的座子围棋，也达到了巅峰，或者可以更准确地说，中国围棋最强的时代，就是在三百年前左右的乾隆时代。

当时的中国，名家辈出，其中更有像黄月天（龙士）、施定庵（襄夏）等超群拔俗的强手。

但两国的翘楚，道策先生以及后起的丈和先生，与清朝的黄月天、施定庵、范西屏三位棋圣，并没有在盘上一争短长的机缘；道光、咸丰年间，争夺名人碁所失利的幻庵因硕，曾有意来华，与当时中国的大国手周小松切磋棋艺，然也因海路不通而作罢。

但清代大国手的棋力，我以为是到达了非常了不起的程度的，应相当于日本的名人一级的水平。

我是根据从清朝流传下来的棋谱集，而得出这一判断的，五十年前我对川端先生如是说，时至今日，我仍然抱持这样的信念。

但清朝并没有幕府将军为棋士提供禄米，也没有“名人碁所”、“御城碁”这样严密的制度作为支撑，而只有贵族或富豪不定期主办的棋赛，中国顶尖的名手，于是依赖悬赏的奖金获得收入。

在康熙时期，黄月天独步天下，没有人能和他相抗衡；到了乾隆年间，则是施定庵与范西屏两人并立的时代。

“但是不知何故，两雄之间的对弈局数很少，全部不过十二三局而已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富豪所举办的十局赛，这十局棋被称为千两之棋；也就是说，一局就相当于一百两的价值，而当时的一千两，以今天的价值来看，应该相当有一千万元（指上世纪50年代的日元。

——编者注）吧？

此二人就可以说是相当高强的专家棋士，并且一生就是以围棋为职业而持续地下棋。

”“其中还有名为‘血泪篇’的黄月天与徐星友之对弈谱流传于世。

徐星友当时虽然已号称国手等级，但是其棋力还是比不上黄月天，两者当时的局差是先二左右，但是黄月天却说实际上可以让徐星友三子，于是徐星友非常愤慨，真的就和黄月天下受三子的十局赛。

当然，最后这个十局赛是黄月天输多胜少，不过还是有几局棋是黄月天漂亮地获胜，所以被称为‘血泪篇’，是非常精彩的名局。

”但到了清朝的末年，中国的围棋水准急剧地衰退，到达了谷底。

我的老师顾水如先生、汪云峰先生，与中国最后一位大国手周小松，可能要以“先二”的棋格才能与之相抗。

此后，中国围棋的水准慢慢回升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终于达到今日的光辉兴盛局面。

中国清代的围棋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，既有清末中国围棋急剧衰落，在一般人心目中造成了中国古棋不如日本围棋的深刻印象，又有那时的战法，与现代的围棋大大不同的原因。

因为，“即使看了乾隆时代的古谱，也无法应用到现代的下法中，因此不受到重视，也很少被拿来研究”。

但围棋的玄妙、幽深，又非一时一地、一人一局所能勘破。

三百年前的下法，在今人看来，已经有了不甚满意的地方；三百年后，后人看我们今天的棋，是否也会抱持同样的看法？

我们虽然不得而知，但以事理推断，明矣。

祖德先生发思古之幽情，整理国故，他的着眼点，想来也在此处。

此举善莫大焉，于是欣然草文，以为响应。

序常振明祖德先生的“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”交由中信出版社出版，是文化界、围棋界的一件盛事。

我与祖德先生的交谊已经有几十年了，因为在入读大学以前，我曾经是北京市的一名专业棋手。

<<襄夏战梁程>>

在棋上，祖德先生是我的前辈，在国家队一起训练或比赛时，我常有机会向他请教。

在年龄上，祖德先生长我十二岁，温文尔雅，待我如同兄长一般。

我在棋界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这一段浓厚的记忆，常常令我回味。

那时候，我们的国家队基本上还是以日本为师，耳濡目染的是日本棋界所开发出来的下法，如小目的定式，木谷实与吴清源的新布石，运筹布子讲究棋理和棋形，等等，并且在棋手中间，有一种赶超日本的气氛，于是，对我们的前辈，明清时代的国手所遵循的下法，当时并没有余力过多地涉猎。

但是从2005年起，我们的年轻棋手常昊、罗洗河、古力，包括中信北京队的孔杰等，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了一系列的佳绩，从顶尖棋手的层面以及整体厚度的层面，可以说，我们不仅超过了日本，与以前的“苦手”韩国相比，也占了一点上风。

在这样的形势下，回过头来研究古代围棋，从我们的古谱中汲取营养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的确是非常好的时机。

唐太宗曾经说：“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。

”历史这面镜子，不仅记载了过去，从中也可以推知未来。

像我国的古代围棋，经历了魏晋、唐宋，到明清时达到了顶峰，但从清末至民国，随着国势的衰退，围棋的水平也大大地倒退。

只是在新中国，由于陈毅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提倡，围棋才重新步入了兴旺的局面，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终于回到了我们的祖先曾经达到的“盛世景象”。

抚今追昔，令人感慨。

围棋的盛衰、兴替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在里边起作用？

陈毅元帅有一句名言，叫做“国运盛，棋运盛”，说的是外部的环境，国家的繁荣，是围棋事业兴盛的主导条件；另一方面，棋手们是否有开阔的胸襟、前进的动力，乐意于从方方面面汲取养分的谦虚态度，我以为也是重要的内部因素。

围棋是我们的国粹，凝聚了先人们杰出的智慧。

对它的继承和发扬，是我们每一个热爱围棋的人都无可推卸的责任。

中信集团多年以来一直关注着围棋事业的发展以及围棋文化的传承。

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第九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，中信集团曾给予了一定的资助。

在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创办之初，中信集团组队“中信大三元”，连续四届参加了比赛。

2009年，中信集团再度与北京围棋队联手，更名为“中信北京队”，重返围甲的大舞台。

此外，对于围棋团体的成长、青少年棋手的培养，中信集团也曾稍尽绵力。

中信出版社以前曾经推出过吴清源大师的作品，如他的自传《中的精神》，以及他的棋谱选集《人生十八局》等，获得了一些好评。

这次与祖德先生携手，把目光转向我们的传统文化——明清时期的古谱，制作一个大系列，以此来传承和发扬国故，也希望得到读者的认可。

自序陈祖德如果不是中华民族来发明，世界上至今也不会有围棋。

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。

人们经常提四大发明，其实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发明创造何止这四项？

譬如围棋，就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发明。

围棋的历史悠久，远远早于四大发明，而且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智慧。

四大发明固然了不起，但只是我们比其他民族先走了一步，如果我们不发明，其他民族早晚也会发明。

唯有围棋，如果不是中华民族来发明，那么，世界上至今也不会有围棋。

围棋深奥莫测、变化无穷。

我们的祖先在数千年前发明围棋，数千年后的我们，怎么想都想不明白，都觉得不可思议：先祖有怎样的聪明怎样的智慧才能发明围棋？

难怪有人认为围棋是外星人发明的。

还有不可思议的是，历史无情，只要跟不上历史的发展，不符合时代的节拍，历史必然将它淘汰。

数千年的历史长河，不知淘汰了多少东西。

<<襄夏战梁程>>

多少文化艺术才短短二三百年的历史，如今已无以存矣，或者是需要保护需要抢救矣，偏偏围棋越活越年轻。

围棋的历史悠久，远远早于四大发明，而且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智慧。

围棋历经数千年，非但没被淘汰没成为老朽，相反，如今生机勃勃、热力四射、阳光灿烂。

今天的围棋，在国内有长江后浪推前浪般的汹涌的爱好者，特别是少年儿童爱好者；在世界上更是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所接受、所喜爱。

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艺术却绽放出无比旺盛的生命力，这是最不可思议的。

我国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和文人墨客都会下围棋，其中有很多对围棋情有独钟，甚至痴迷。

他们留下了大量的有关围棋的诗词赋文以及趣闻轶事。

历朝历代对社会有着极为重要影响的群体，可能在交往和游戏间，就肩负起了围棋的薪火传承。

魏晋唐宋时期我国的文化艺术包括围棋蓬勃发展。

围棋本身具有文化性和竞技性两个主要方面，而我国古代社会重视的主要在精神层面，好像觉得看重竞技看重胜负似有悖文化艺术的清雅脱俗。

苏东坡的名言“胜固欣然，败亦可喜”，是对胜负的一种洒脱，也是当时的一种人生态度。

我国古代围棋水平真正的提高是从明末开始，至清康乾盛世达到了无限风光的顶峰。

正如陈毅同志所说“国运盛，棋运盛”。

祖国的千年前的精美棋具，只在日本奈良的博物馆“正仓院”。

康乾时代，棋坛人才辈出，强手如林。

令人可喜的是，留下了大量的棋谱和各种围棋著作。

但同时我又感到遗憾和痛心，因为这之前留下的围棋史料太少太少。

围棋最早的古谱是宋本《忘忧清乐集》，其中有三国时代东吴的孙权与吕范的对局，但这张棋谱的真假无从考证。

围棋在春秋战国时已相当普遍，孔、孟曾多次提及围棋。

但春秋战国时的围棋究竟怎么样？

孔、孟的围棋又下得如何？

想看到竹简时代的棋谱无疑是种奢望。

然而秦代有了篆书，尤其是汉代有了隶书，文字已发展到书法艺术，当时留下围棋的棋谱应当是有可能了。

但历代那些酷爱围棋的有名的君王、士大夫以及大诗人、大才子，如汉高祖刘邦、曹操和曹丕父子、梁武帝萧衍、唐太宗李世民、唐玄宗李隆基、宋太祖赵匡胤、宋徽宗赵佶、明太祖朱元璋以及他的大将徐达和大臣刘伯温等等，还有杜甫、杜牧、白居易、王维、刘禹锡、李商隐、韩愈、陆游、文天祥和王安石、黄庭坚、苏东坡等家喻户晓的文坛北斗，他们为围棋留下了丰富的传闻和诗文，可就是未留下一张棋谱！

这给人留下无限想象和无穷遗憾！

我们的智慧而潇洒的先人呵！

难道是历史太悠久了，反而不懂得历史的价值？

难道是文化太丰厚了，反而不珍惜文化的遗存？

不要说棋谱，就是棋具，远的不用说，就说最后一个王朝——清代，围棋如此盛行，可我却从未见过清代的棋盘棋子。

在日本奈良的博物馆“正仓院”中，珍藏着两副唐朝皇帝赠送日本的棋盘棋子。

棋盘由上好的紫檀木制作，棋盘的四周边上是精致的图案。

对局双方可由棋盘边上拉开一个抽屉，其中各放着一个乌龟造型的棋盒。

棋盒中每颗棋子均画有色彩艳丽的飞鸟。

这两副棋具，材质优良、构思精妙、工艺极致，可谓美轮美奂，无与伦比。

我们的祖先怎么能制作出如此精美的棋具，如此超一流的工艺品？

！

<<襄夏战梁程>>

望着这两副棋具，可以想象围棋在千年之前是什么样的水平。

可是祖国的千年前的精美棋具只能在异国他乡才能见到，而在自己的祖国，不要说千年之前，就是百年历史的一般棋具都难以寻觅！

我国最早的围棋文献《敦煌碁经》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。

我多么希望能够在故国故土一睹！

但再想想，《敦煌碁经》这部文献毕竟保留下来了。

如果它不曾远渡重洋，依然在故乡，那它的命运又会怎样？

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太多太多，但我们失去了多少多少？

围棋有娱乐、教育、交流、健身等功能，何必都要挤上职业棋手这独木桥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围棋得到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心，得以很快复兴。

我国围棋界以赶超日本为目标，精诚团结，自强不息，水平急速提高。

围棋事业需要拿成绩来证明自己，人民大众需要成绩以得到鼓舞，祖国需要成绩来扬眉吐气。

围棋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，竞技性越来越突出。

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忽视了围棋竞技性，而在这短短几十年中几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。

竞技性当然很重要，但任何事情都有个度，当整个社会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竞技和胜负上，自然，文化性被忽视、被冷落、被遗忘，甚至被淡出。

现在我国有很多孩子学围棋，不少孩子的家长为了把自己的宝贝培养成常昊、古力这样的世界冠军，大人孩子付出多少代价，使快乐的围棋变得那么的沉重。

在北京集中了全国各地那些非常聪明优秀的小棋手，很有些孩子甚至宁可学业荒废，或者连小学都上不上，只是希望成为职业棋手。

这似乎是围棋的盛事，但总令人感到不是滋味，这是围棋事业发展的一个异化现象。

围棋与生俱来地是多功能的。

首先是娱乐功能，围棋充满着乐趣，魅力无比，能叫人乐此不疲，忘乎所以，用现在的流行语叫“乐活”。

围棋有教育功能，围棋好的孩子数学一定好。

围棋的核心是阴阳，充满着辩证法，包含着丰富的哲理。

围棋所包含的哲理可运用到方方面面，可提升境界，启迪人生。

尤其通过学围棋能使孩子的素质全面提高。

围棋有交际功能，围棋有个别名叫“手谈”，下棋即交流，可能得到终生的好友。

纹枰手谈心领神会有利于和谐社会。

日本的“围棋五得”，头两条，即得好友、得人和。

围棋还有健身功能，围棋能使大脑得到很好的锻炼，益智健身，下围棋的人大多长寿，我还未听说过下围棋的人患老年痴呆症。

日本“围棋五得”的最后一条，即是得天寿。

古人还创造出无数优美动人的围棋诗词赋文。

当代有人收集整理出版了一本《围棋文化诗词选》，其中不少古代围棋诗词佳作，但我深信这只是历史上的一小部分。

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围棋，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带来了无穷乐趣！

何必都要挤上职业棋手这独木桥。

现在的社会功利性过强，这种功利性有意识无意识地影响着我们的棋手。

如研究棋谱只看重韩国一线棋手的对局，日本的棋谱已不屑一顾，更何况我国的古谱。

很多棋手根本没看过我国的古谱，恐怕连古代那些大国手的名字也全然不知。

要知道中华民族有多智慧吗，围棋古谱告诉你。

围棋水平的等级分为九段，这源自于日本，而九段的等级无疑来自于我国古代的九品。

我国古代围棋的等级和官员一样，也分为九品，一品最高，九品居下。

每个等级又有其很雅的名称，一品曰入神，以下分别是坐照、具体、通幽、用智、小巧、斗力、若愚、守拙。

<<襄夏战梁程>>

多么有意思。

古人给围棋取了很多别名，以形状命名的是方圆、纹枰，以颜色命名的是黑白、乌鹭。

在晋代又给了围棋不少雅号，如手谈、坐隐、烂柯、忘忧，围棋太有趣、太吸引人，故又将围棋称为木野狐，等等。

唐宋时代的围棋国手王积薪、刘仲甫写的“围棋十诀”、“棋经十三篇”，享誉海内外，至今常被人引用，说明其含义之深刻，影响之巨大。

清代留下了很多精彩纷呈的棋谱。

古代的下法与现在有所不同，主要区别在古代对局双方先在对角放上座子，此外要还棋头，即多一块棋多还一子。

这两条决定了与现在下法上的差异。

但棋理相通，技艺无异，我们研究古代棋谱，不但可以让我们了解过去，而且可让我们欣赏古代优秀棋手的才华，他们构思的巧妙、计算的精确令人折服。

清代的围棋国手众多，每人风格不同，各有所长。

最突出的是三位大国手，他们是康熙年代的黄龙士和乾隆年代的施襄夏、范西屏。

他们将中华民族的智慧在围棋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达到了古代围棋的巅峰。

有人可能会拿现在的棋理、现在的眼光去审视、评判他们，感到有这样那样的不足，因而取否定态度。

但这显然是不公正的，是片面的。

不同的时代不能这样比较，正如不能拿吴清源同李昌镐相比较，正如再过数百年，或有人会指责今天的棋手这样那样的不足或不明棋理，因此否定今天的棋手，这又公正吗？

明清的围棋国手众多，又传承了大量的棋谱。

虽然有棋谱，但从未有人系统地评注。

我曾出过一本《当湖十局细解》，仅此而已。

把古代国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、最精彩的对局有系统地评注讲解，以此介绍给当今社会，这项工作工程很大，但又必须有人去做，不做对不起我们的先人，也对不起今人，对不起当前蓬勃发展的围棋大好形势。

前年，我曾在天元围棋频道中讲解了一些古代国手的对局，越讲越感到有必要将这些古谱有系统地整理出版。

我终于决心挑起这副重担，这副担子可能要压我多年，但这是我的责任，是我的使命。

吴清源先生得知我要从事这项工作，特意从日本发来长文，表示对我的支持。

吴先生是我所景仰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棋士，他以九十六岁的高龄，写下这么多的文字，我既感到愧不敢当，又感到莫大的鼓舞。

这里，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好朋友、云南大益茶业集团的董事长吴远之先生，他不但将大益普洱茶办成我国规模最大、效益最好的茶企业，而且他把那最大和最好的决心，投向了慈善事业，投向了文化事业。

我目睹了他那云南大益爱心基金会这些年来所做的善事，我觉得大受益和大感动！

吴先生知道我要出一套古谱大系，鼎力相助，使我能安心地一步一步走进古谱。

我也要感谢中信出版社。

该出版社隶属于中国中信集团，中信集团多年来与围棋有不解之缘，对我国围棋事业作出很多贡献。

现在中信集团的董事长常振明先生年轻时是围棋高手，参加过不少重大比赛，并取得过出色的成绩。他对围棋的理解和热情使我决心并放心地将此书交给中信出版社。

中信出版社曾出版过数本吴清源的书籍，很获好评。

我相信这次和中信出版社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。

最后，我要感谢我的两位助手程天祥和黎剑。

我虽然已退休，但工作依然繁忙，简直不亚于退休前，因此靠一己之力恐难以胜任，如今有了两位尽心尽力的助手，天助吾也。

<<襄夏战梁程>>

内容概要

施定庵（襄夏），系我国清代雍正、乾隆时期，与范西屏并称为“亚圣”的大棋家。他的棋风“精严邃密，操算深远”，如“汪洋巨浸，深不可测”。他的棋艺，初成于弱冠之年，经过梁魏今、程兰如两位先辈的磨砺，于二十三岁时，因魏今语而有顿悟，遂成为一代大家，与西屏双雄并峙，光耀于乾隆棋坛，把旧式座子围棋推向了巅峰。本书所收录的，便是定庵于棋道有所悟之后，与梁、程二先生分先角胜之棋谱。此时，定庵之艺虽欠老成，然已至喷发之态，势不可当，足见其平生之概。

<<襄夏战梁程>>

作者简介

陈祖德，1944年生，上海人。
历任国家体育总局棋类运动管理中心主任、中国棋院院长、中国围棋协会主席、国际围棋联盟副会长。
我国建国以来的杰出运动员和教练员。
1999年被评为“新中国棋坛十大杰出人物”。
曾两次获得体育荣誉奖章。
曾获1964年、1966年、1974年全国围棋个人赛冠军。
他是我国第一位战胜日本九段的棋手。
1982年被授予九段。
“中国流”布局的创始人。
著有《超越自我》、《当湖十局细解》、《无极谱》等书，其中《超越自我》曾获“人民文学奖”。
第五、六、七、八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
<<襄夏战梁程>>

书籍目录

吴清源	总序	
常振明	推荐序	
吴远之	推荐序	
陈祖德	自序	
施襄夏	——梁魏今	
第一局	○施襄夏	梁魏今
第二局	○梁魏今	施襄夏
第三局	○梁魏今	施襄夏
第四局	○施襄夏	梁魏今
第五局	○施襄夏	梁魏今
施襄夏	——程兰如	
第六局	○程兰如	施襄夏
第七局	○施襄夏	程兰如
第八局	○程兰如	施襄夏
第九局	○施襄夏	程兰如
第十局	○施襄夏	程兰如
后记		

<<襄夏战梁程>>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插图：第一谱 1—3 对白 1 这样的挂角，到了施襄夏、范西屏的时代，主要的应法就是黑 2 的分投了，如过周时代那样的倚盖已变得非常少见；而且，双飞燕也开始少起来了（如白 3 的应法）。

如此一来，棋局各处没有迅速定型，进程上也就变得更富于变化了。

施襄夏（1710—1770），名绍闇，号定庵（也作定盒），襄夏是他的字，浙江海宁人。

他既是范西屏的同乡，年岁大略相当（施小范一岁），又与范同门，少年时期都拜入俞永嘉门下学弈。

后来，当他棋艺大成，被当时的棋界所推崇，又与范西屏一起被尊为海内“亚圣”，即天下仅次于“棋圣”黄龙士的第二号人物。

因此自 1730 年以后，中国的棋界可以说是进入了双雄并立的时代。

施襄夏与范西屏的缘分，真是奇妙而奇特。

双雄并立，交相辉映，笑傲棋坛的景象，在清代的棋坛并不多见。

幸而有此际遇的，大概只有之前的周东侯与汪汉年相遇于广陵，之后的周小松与陈子仙的惺惺相惜，但他们的水平和影响远不如施范。

至于清代以前，由于记载的缺失，我们已无从得知。

相形之下，黄龙士却是一位寂寞的大国手，终其一生，他也没有找到能与他抗衡的对手。

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遗憾。

徐星友曾在《兼山堂弈谱》中评黄龙士、盛大有的对局时说：“大抵劲敌当前，机锋相迫，则智虑周详，若非劲敌，虽胜亦乏精彩。”

”这指的是龙士与大有年岁悬殊，棋力亦有高下，因而龙士虽胜，胜得也难言精彩。

星友接着慨叹道：“求其两相对垒，年岁相当，各极所长，绝无遗憾，上下古今，殊不可多得也。”

”诚哉斯言。

施襄夏、范西屏之为后世所艳羨，原因当在于此。

施、范之前，还有两位鼎鼎有名而年岁稍长的棋家，即梁魏今与程兰如，被棋谱辑录家邓元鏞一道尊为“四大家”。

梁先生约生于 1670 年，年长施、范约四十岁，以今天标准而论，可以称得上是大前辈，似乎不宜把他与后起的施范归于一辈。

关于他生平的事迹不太多，从棋谱所见，他跟徐星友有过交手，胜多负少，与程兰如有过三十二局争棋，多负。

但据《海昌二妙集》“范西屏、施定庵二先生年谱”记载，他与施范的缘分不浅，曾指导过青少年时期的两位后辈。

施襄夏二十一岁时游湖州，在唐使君官署巧遇梁程，施自称“受先数局，获益良多”。

<<襄夏战梁程>>

后记

施襄夏名绍闇，一作定盦，我们习以为称的“襄夏”，是他的字。

作为清代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年间的大国手，他的生卒年月，幸而有确切的年份可考。

这项艰巨繁复的工作，我们要感谢施先生身后的两位棋谱辑录家，《海昌二妙集》的作者斤竹山民（蒯光典）和浮县末斋主人（黄绍箕）。

在该书“范西屏、施定庵二先生年谱”中，两位先贤以年为经，以范施二人的自序以及他人的著述（旁证）为纬，勾勒出了范、施二先生的平生大概，考证精严，深可采信。

这便让缺乏材料的我们，大大省去了钩沉之苦。

于是，我们不妨遵照他们的提示，来探究一番施先生的大略，追思他的丰采。

据“年谱”，康熙四十九年（庚寅），即1710年，施襄夏出生于浙江海宁的一个书香人家。

他的父亲工诗文，擅书法，兼画兰竹，晚岁家居，常焚香抚琴，对客围棋。

有这样一位多才多艺、颇足雅趣的父亲，施襄夏于是自幼入塾习字，出落得“秉性纯孝，性拙，喜静，羸弱多疾（体质单弱，多病）。

先学琴，后复嗜弈”。

施襄夏享年六十一岁，寿既不永，想来跟他的先天不足（喜静，羸弱多疾）或有一些关系。

施先是在家庭的熏陶下学琴，在他十一岁时，于他之前入俞长侯门下学棋的范西屏，已经与师父齐名，于是施“慕而从学焉，受三子”。

（从这条记载可以推知，施幼时仰承父教，并不是单纯的学琴，他一定也对围棋之道有所濡染，并下过一番工夫。

否则，他不能一入师门，就达到被授三子的水平。

因此，更确切地说，幼时的施，应是琴、棋兼而习之，只是在他逐渐深入的过程中，他对弈的兴趣盖过了琴。

如此才能有“慕而从学”的行动。

明朝的一位隐者陈继儒曾有过一段隽语：“香令人幽，酒令人远，石令人隽，琴令人寂，茶令人爽，竹令人冷，月令人孤，棋令人闲……”（见于《岩幽栖事》）施“先学琴，后复嗜弈”，我们从中可以见到，施襄夏从小喜好的乃至于终身不辍的，都是使人静、使人寂的艺类，他的最开始的选择也许是出于他的“喜静”，是性格方面的因素使然，但是，这两样技艺，他的终身习之，或许又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他身体的羸弱。

然而，施的身体虽然不是特别强健，但他的精神、性格方面却十分强大，因为“性拙”，他可以埋头于一项技艺，深入钻研，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努力，达到这项技艺的最高峰。

比如，在入师门一年之后，他从受俞长侯三子，即升到了可以与他的范师兄争先的地步。

在他成名之后，与范西屏对局，他可以为一手棋，“敛眉沉思”至太阳西下而不落子。

他的性格使他的棋艺精妙非常，名扬千古，以此等性格加之于琴，在琴上不间断地努力，想来他的琴技也能达到一流的罢。

也是在施十二岁这一年，他与师父、师兄同游杭州，请益于徐星友。

星友此时被称为“徐叟”，推算年龄，当有七旬以上。

徐授范、施以三子，后赠施《兼山堂弈谱》（徐氏败给程兰如，南归杭州后，发愤的新作），施自称“潜玩数年”，于是渐窥堂奥。

杭州之后，又有松江之游。

这次他们拜会的是钱长泽。

因为这次的相识、相交，在以后的岁月，范施都与钱先生有过往来。

这一年，施十五岁，西屏成第一手。

后三五年，不甘于后的定庵终于赶上，与师兄并列为第一手了。

然而，又数年后，施（二十一岁）在湖州遇梁、程，“尚受先耳”。

施二十三岁，“年谱”载：“定庵携魏今游砚山，见山下出泉，闻魏今言有悟，遂与诸前辈分先角胜负矣。

<<襄夏战梁程>>

”在二十一岁至二十三岁两年间，以施襄夏的性格，以及对梁程受先的棋分予他的打击，我想他在棋上一定会下一番苦功。

经过这样的苦学和深思，听到梁魏今以流水喻棋道，才会恍然而有所悟。

这种顿悟，这种豁然开朗，从此在棋上开辟新的天地，正是王国维所称的为学之第三层境界——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伊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

呜呼，棋艺之道，磨砺亦如斯乎。

施棋艺既大成，于是慨然游京师。

此后数年间，直至范、施受到张永年的邀请，同赴浙江当湖，任西席之教，施（以及范）事迹无载。

据鲍鼎引胡敬夫言，范施在京师期间，曾对弈十局。

“定庵忌害西屏，疑系传闻之过。

”蒯、黄两先生所言，与我之见正同，范施在京师，都是天下英雄谁敌手的气概，以他们淹留的时间之长，加以好事者的撮合，两人对弈十局、观者如堵的盛景，我是宁信其有。

施三胜七负，大约也说得过去（十局棋中范的状态更优于施，这个比分完全有可能），但是胡敬夫认为施深以为意，一力阻挠十局棋的刊印，戒之流传，也许有些过了，以施的位分，非权非贵，非豪非戚，在京师这样的辐辏之地，如何能有这般的遮盖之能？

施三十岁，范三十一岁，二先生双雄并峙，于是“对弈于当湖，凡十局，胜负相当。

”此时范、施正当精力弥满，棋艺过人，因此这十局棋，被誉为我国座子围棋最高水平之代表作。

关于对局数，蒯光典、黄绍箕持十局之说，另有十三局之说。

现存范、施遗谱共十一局，系由散见于各家的棋谱集辑录而成，其中一局注明“己未弈于当湖第一局”，因此后人将范施之全部对局，都名之为“当湖十局”。

个中的详情，我打算在第八册《范施十局》（也即《当湖十局细解》修订版）之后记中，再作展开的讨论。

约十年后，施四十一岁时，“松江蒋昂霄招李良同学弈于定庵。

”这位李良先生，大约是人如其名，虽然在棋史上籍籍无名，然施以身后事相托，可以想见其为人。

后两年，“定庵游扬州，与黄及侣弈于卢雅雨运使署中，及侣受二子。

”黄及侣受业于程兰如，后数年，程携黄及韩学元同游晚香亭，三人对弈共十五局，由程兰如评点臧否，刊为《晚香亭弈谱》。

卢雅雨者，即时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，他的官署，蔚为当时棋界名流雅集之所。

范、施应不止一次在此往返勾留。

因官衙之中有水井曰桃花泉，范在署中所著之大作，遂以《桃花泉弈谱》为名。

施五十二岁，“复客扬州，教授诸弟子。

”一个“诸”字，道出了从施学艺者甚众。

教授之余，施以四年时间，著成《弈理指归》（或称“指归图”）。

卢见曾为之作序，“为刊行之。

”施五十五岁，“无锡吴氏选刻《弈妙》，定庵鉴定。

”施五十六岁，“游金阊（今苏州），主（住）汪秩似园（汪氏之号）家数月，校订《弈隅通会》二卷。

”施五十八岁，“定庵客苏州，著《弈理指归续编》（或称“指归续编”），授李良。

”施六十一岁，“定庵卒。

”蒯、黄二先生旁注云：“张世达指归图序云，图成，而施先生已逝。

李良指归续编序云，先生下世，忽忽数年……疑定庵卒即在庚寅（1770年）春夏间也。

”生也庚寅，逝也庚寅，施先生的千百遭逢，正是一个甲子的轮回。

施之棋，如汪洋巨浸，精严邃密，与梁、程、范并称为“四大棋家”，与范并列“亚圣”，又著作等身，有《弈理指归》、《弈理指归续编》传世，于棋理见解极深，校订《弈隅通会》，评谱《手批十八局》（被誉为千古弈谱之冠）等，他实在无愧于“亚圣”之誉。

人生有他这样的际遇，达到这样高的境界，复有何憾。

<<襄夏战梁程>>

编辑推荐

《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(第2辑)6:襄夏战梁程》系统精解中国围棋，是对中国围棋智慧的总结和提升，给围棋专业、人士、围棋爱好者的精品珍藏礼物。
中国围棋古谱很少有人系统诠释，陈祖德以一人之力，将最精彩的中国围棋古谱系统精解，让今天的围棋界人士顺畅了解和学习中国围棋古谱，是独一无二的重要工程。

<<襄夏战梁程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